



纯正的心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

〔美〕特雷西·斯特朗 著
海琳·凯萨

世界知识出版社

纯正的心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

〔美〕特雷西·斯特朗 海琳·凯萨 著

李和协 张雪玲 译
苏 光 郭泽沛
唐建文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TRACY B. STRONG HELENE KEYSSAR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3

据美国纽约兰多姆书屋 1983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封面设计：孙为平

纯正的心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

〔美〕特雷西·斯特朗 海琳·凯萨 著

李和协 张雪玲 译

苏 光 郭泽沛

唐建文 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科技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320,000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800

书号：17003·1044 定价：2.10 元



1912年前后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58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会见斯特朗女士。



1946年在延安与朱德、康克清和毛泽东的女儿合影。



1962年周恩来同志出席了斯特朗女士77岁生日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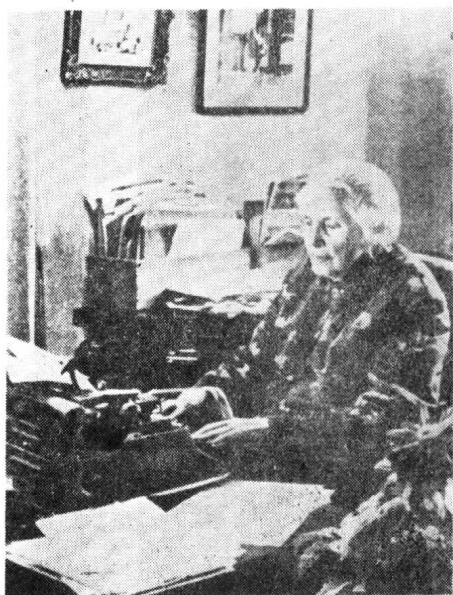
陈毅同志出席斯特朗女士79岁生日宴会。



1964年在河内与胡志明同志合影。



80岁零9个月高龄的斯特朗女士
在北戴河游泳。



斯特朗女士在工作。摄于
1965—66年间。

出版说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是美国进步作家，一生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坚定支持人民斗争。她和史沫特莱、斯诺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正如邓颖超同志1984年9月在庆祝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简称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的贺信中所说，斯特朗等三人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倦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他们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

本书是斯特朗生平事迹的详尽而生动的纪录。作者特雷西·B·斯特朗与海琳·凯萨是斯特朗的侄孙与侄孙媳。两人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他们曾对斯特朗一生的经历进行长期研究，搜集了她的家信、笔记以及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作品，并于1980年专程来华，采访了曾与斯特朗相处过的许多人士。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本书忠实地再现了斯特朗投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战斗道路，并从侧面反映了本世纪发生的几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情景，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1985年是斯特朗一百周年诞辰。我们谨以本书的翻译出版表示对她的怀念。我们也希望本书能作为研究和学习斯特朗的一份有价值的材料。

1985年11月，本书作者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欣闻我社即将出版该书的中

译本,特赶写了“致中国读者”一文。我们谨一并译出飨以读者。

本书涉及大量史实,其中个别细节可能有与实际不尽相符之处,为保持原书本来面目,一律未加改动。书中引用的我国领导人的言论,也均照原书译出。原书页末无注解,全部页末注均系译者所加。

1985年12月3日

致中国读者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不需要再加以介绍了。她来中国访问过六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富戏剧性的时刻：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期；1927年，正好在国民党分子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1938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1940年，统一战线开始破裂的时期。在她第五次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向她表明了对于革命力量将会迅速取得胜利的信心，并向她阐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最后，从1958年到1970年她在北京去世为止，她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复杂而又十分艰难的发展历程。

虽然对她已不必再作什么介绍，但作一些解释还是需要的。由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访问中国，中国的读者自然会把她当作中国的一员。的确，许多美国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斯特朗是个离开美国、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妇女。

有一件事是非常明显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因为她希望在中国找到她自己的国家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而她的目标始终是为她自己的同胞服务。从1921年她第一次访问苏联到她生命结束，她一直遵循着这条道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她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她在美国随处可见的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她还认识到，她必须抵制当时在美国存在的反国际主义的倾向。她父母的教导以及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受都使她懂得：美国必须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并向这个世界学习。

她竭力提倡要具有国际主义的眼光，但她也看到，当轮到美国

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时，很可能会有种种危险降临到它头上。她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常常相信自己是正义的，这也许正与历史上某些时期的中国一样。安娜·路易斯担心，这种正义感如果出现在大国身上，很可能会使它产生恃强傲慢的倾向。我们相信，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她才如此坚决响应毛主席在1946年的那个声明，即：一个大国，如果脱离人民，就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知道了这些事实之后，我们希望中国读者如何看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呢？

首先，我们希望他们把她当作一个美国来进行评价。她的祖先是美国最早的移民之一，她为此而感到骄傲。在她出国旅行的整个岁月里，她从来都不是一名流放者，而这，我们认为，正是她的伟大力量之一。

第二，我们希望非美国人认识到基督教对她的教育是多么重要。虽然她在大半生中并不是基督教会的成员，但她得之于她的牧师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想象正是她产生不屈不挠力量的关键所在，这种力量驱使她周游世界，探求真理。的确，处于鼎盛时期的基督教会能够采取不同的民族形式，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则探索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我们看来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她从不认为对中国或对苏联适合的东西也会自然而然地适合于美国，她只是认为支配着各个国家的是同一种精神。

还有三件她关切的事应提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其一，安娜·路易斯特别关注她所访问的国家中妇女所起的作用，尽管她很少呼吁人们明确地注意这件事。她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千真万确的；她认为，所有的地板都经常是由妇女打扫的，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她的著作和文章中充满了对于模范妇女的描述，从她们身上人们依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其二，虽然她有时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但她却广泛地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甚至在隔了几十年之后仍对她怀有强烈的感情。在我们为写作本书而进行调查的三年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

的莫过于那些热爱她、与她发生过争执、曾和她一起旅行、一起工作的人对她的强烈感情和深切怀念。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人对他的怀念。我们希望这本书能把这些感情转达给那些并不直接认识安娜·路易斯的人。

最后，本书的出版恰逢中国隆重纪念外国友人对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作出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代表着其他许多人，那些人虽然贡献和影响不及他们大，但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希望这样的朋友的队伍继续得到发展和壮大。

我们要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我们从事本书写作期间给予的帮助、关心和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没有他们，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

特雷西·斯特朗 海琳·凯萨

1985年11月24日

一个令人注目的美国人的画像

路易·艾黎

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作者抓住了贯串于安娜·路易斯一生的精神实质。第一部分主要反映她的家庭和她早年在美国的生活，其余大部分是写她在俄国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穿插着她访问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德国和立陶宛的情况。

在北京，她和我同住在一幢楼里，合用一个厨房，在她最后的十一年里，我们一直共同进餐。尽管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故事，但她从来没有一次向我谈过关于她在苏联坐牢和接着被驱逐出境的全部经过。

当她晚年写自传时，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搁笔了，留下了一段空白，接着就写她在中国的岁月，在中国这最后的十一年是她感到最愉快的日子。在这本传记里，作者帮助把那段空白补上了。

关于她在中国这段时间的记载，作者不得不依靠人们的回忆来写，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回忆会变得模糊，而真实情况则容易被遗忘。对于在一个与自己本土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要对所有要了解的问题的可靠性作出充分的评价确实是不可能的。

安娜·路易斯晚年的真正不利条件是她不会中文，行动不便。这些，再加上年老体衰，使她只能依靠她的一些中外朋友所提供的情况，而这些人“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派别斗争，总想对她施加影响，使她加入他们的小圈子。安娜·路易斯一生勇于追求真理，但当她的体力不允许她这样做时，她就受挫了。

因此，这本书的某些次要之点可能会受到批评，但那些用熟练

的手法介绍的主要结论是无懈可击的。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本书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对于这段历史,她自己曾作过极为生动的描述。

这本书也定将大大增进她所出生、成长的国家与她在那里去世的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

安娜·路易斯是一个“人物”,有着坚强的性格,为了实现她的既定目标,她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候,弦绷得太紧了,她会发脾气,这时,机灵的风风(她的秘书)和马海德大夫的安静外交手法就会使她平息下去。我们三人和她在广东从化一起度过了三个冬天,在北戴河度过了两个夏天,她很有幽默感,我们常在餐桌上一起开怀大笑。

对于所有对今天的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读者们在一页页地看下去时,将会随着她度过令人心情激动的时光。书内附有经过精心选择的照片。安娜·路易斯的父亲西德尼·斯特朗和母亲鲁思·斯特朗是十七世纪去美国定居者的后裔。

这本关于她的一生的传记由她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和他的妻子来撰写,是十分合适的,他们现在正在继承和发扬他们家族的传统。

(原载《中国日报》1984年4月5日,张雪玲译)

前 言

我们将发现以色列上帝就在我们中间，那时我们十个人就能抵挡一千名敌人，他将给我们以赞扬和荣誉，使人们将这样描绘后来的庄园：是上帝使它变得像新英格兰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将像是一座山上的城市，所有人们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做这件工作时欺骗我们的神，他就会撤销他目前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将为全世界所议论和耻笑，我们将启开敌人的嘴去诅咒神的行为，以及一切宣扬上帝意图的人们；我们将给许多神的忠实奴仆带来耻辱，使他们的祈祷变成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被从正要走上去的那块乐土上逐出。

——约翰·温思罗普，
《基督教的仁慈，一个典范》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毛泽东，
《和郭沫若同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885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一所有两间房间的牧师住所里。1970年，她在中国北京去世，

在那里，她被以最高荣誉安葬在革命烈士公墓。在她一生的岁月里，她目睹了我们这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巨大变化。从1919年起直至她去世时止，她探索了俄国、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的革命起义，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作品，目的是试图使她的美国同胞相信，这些国家里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不是令人恐惧、而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凡是见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都不会忘记她。她旅行时持的是新闻记者的签证，但是，她决心既报道新闻又对新闻加以说明。她组织劳工，与革命军队一起行军，参加她书中描写的那些事件。她的聪明才智，对左派承担的真诚义务以及她的勤勉使她赢得了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常常也赢得他们的信任。她对托洛茨基很熟悉；与罗斯福总统夫妇在白宫吃过饭；在斯大林的关照下编辑了苏联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她把从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得来的消息向西方作了报道；而在六十年代，她的《中国通讯》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越南、文化大革命以及远东其他重大事件的独特的见解。

她理解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对人们的各项挑战是什么，但是她满怀激情最想要拯救的还是她的祖国。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而且按照一种特殊的美国传统，她的激进思想也带有浓厚的福音传教的色彩。她在幼年时代就从父亲——一位公理会牧师那里学到了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信条，此后就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她记得，“他的言教和身教使我懂得，无论是金钱还是名誉，还是人们对你的看法，都比不上‘自己纯正的心灵’。”

安娜·路易斯身材高大、轮廓分明；她的蓝眼睛惹人注意，她的声音能盖过整个房间里的讲话声音，因此，不仅她的行为而且她的存在也会博得人们的注意。在美国的“共产党人”中，她经常独树一帜，她开辟自己的道路，但她与任何一个哪怕在思想上只有一点共同之处的人也十分乐于来往。与其说她参加过美国左派组织，不如说她曾多次参与它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作为儿童福利运动的领袖，她遇到了不少男男女女，他们试图

改变或补救美国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林肯·斯蒂芬斯，罗杰·鲍德温，简·亚当斯，欧文·洛夫乔伊，诺曼·哈普古德，本·林赛，卢瑟·古利克，埃拉·布卢尔“妈妈”，埃玛·戈德曼和马克斯·伊斯门都是她早期在为重建美国而斗争时的伙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她对西雅图劳工运动的领导和对新生的苏联的支持加强了她与进步的美国政治中的共产党人的联系。但是，安娜·路易斯是个了不起的单独旅行者。在其后的五十年间，随着她从美国到俄国、中国和欧洲不断地奔波，她在美国左翼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复杂。

在她的一生中，她一贯与坚强的妇女保持联系。在她的聪明过人并有独立见解的母亲过早地去世之后，她转向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凯利，莉莲·沃尔德和朱莉娅·莱思罗普寻求友谊和指导。以后，最能吸引她的是亚历山德拉·柯仑泰、宋庆龄和罗斯福夫人那样的妇女。她的最好的作品大都是以妇女为题材的，她的一生生动地展示了她在试图使自己和其他妇女从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种种限制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悲痛和满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我祖父的姐姐。我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知道我这位姑祖母是一位名人，一位我的某些亲戚不大愿意提到的名人。我只见到过她一次，那是在1951年，我那年八岁，我当时和妈妈、弟弟和妹妹从远东回来。我的父母是传教士，父亲留在那里多呆了几个月。安娜·路易斯那时正在美国，她到洛杉矶飞机场去接我们，我记得她是个大个子、坏脾气的女人。虽然她是第一次见到我，可是她对我毫无兴趣。她想找我父亲谈话，当她发现他不在场时，她喊道，“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说着就迈开大步走了。有关中国的一般情况或社交礼节对她没有任何意义。为见到我父亲而跑一趟是值得的，因为她认为他是个特别敏锐而且政治上靠得住的观察家。我们其他这些人都不过是家属而已。

1960年，我在奥伯林学院读一年级时，有一位教师，他的父亲是她的朋友，这位教师说服我给她写信。她当时又到中国去了。她